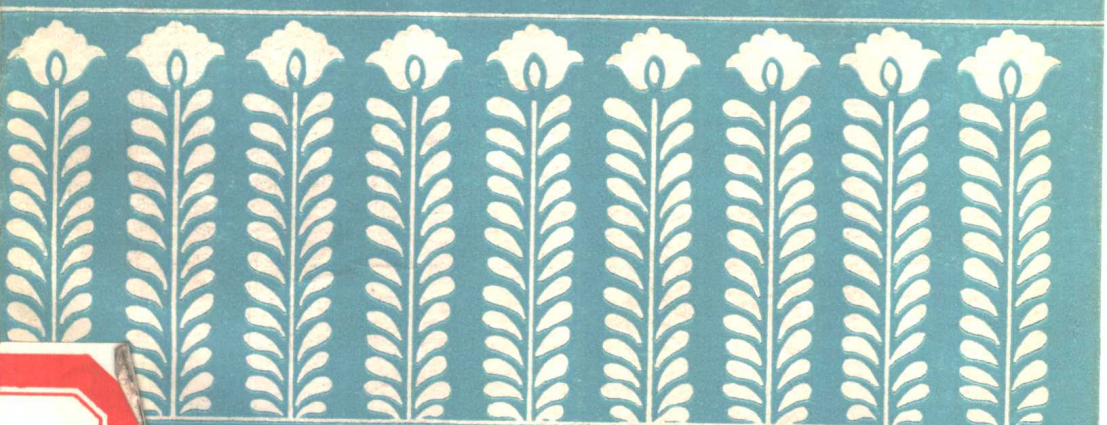




译学丛书

民族语文

翻译研究论文集



民族出版社

—— 译 学 丛 书 ——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编辑组 编

民 族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傅庭训 尹 哲

封面设计：叶 然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

(第二集)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编辑组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 1/2 字数：158千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统一书号：9049·83 定价：1.80元

ISBN 7-105-00227-1/H·14

编者说明

多年来，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为促进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们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翻译经验，并撰写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汇编出版这些论文，对繁荣民族语文翻译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委托，在编辑出版《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第一集之后，又编辑了本论文集。本书读者对象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民族问题研究人员和有关大专院校师生以及热爱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广大读者。

编入本书的论文凡22篇。限于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有的论文尚未编入。本书所编入的论文，基本上按翻译史、翻译通论和翻译专论的顺序编排，而同类论文则按作者姓氏笔画顺序编排。

限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本论文集无论是在文字加工上，还是在编排形式上，都存在不少缺点，我们恳切希望翻译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和批评。

在编辑本论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民族语文翻译界的老前辈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负责同志以及《翻译通讯》杂志社有关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编辑组

目 录

郑俊基

中世纪朝鲜翻译事业浅析..... 1

陶·哈斯巴根

宫布扎布和他的翻译理论.....11

J·那里曼

略论翻译方法和技巧.....16

朴千均

浅谈广播新闻稿翻译特点.....29

张秋生

翻译与民族文化.....37

谭寿康 王怀林

浅谈口译.....41

瞿马洪

翻译原则浅谈.....54

马纳甫

谈谈汉语代词的翻译.....64

艾日布·察克

关于理科教材翻译工作的几点体会.....74

东 和

漫谈名词术语的汉译蒙问题.....79

朵示拥汤

关于汉、景颇、载瓦语文互译法.....88

托列根

浅谈农学术语的哈译法..... 100

李作应

关于翻译中的借词问题..... 108

许粉赤

汉语古典诗歌翻译浅谈..... 117

岳 坚

浅谈景颇语词翻译的挖创借..... 126

罗瓦苦 姚昌道

试论凉山彝语发展新词术语的正确道路..... 132

依不拉音·艾合买提

辞书与翻译..... 141

M·法提玛

试谈儿童读物翻译中语言的运用..... 150

哈 图

复合句的翻译问题..... 154

张世荣

漫谈维吾尔诗歌传统及其翻译问题..... 162

高炳辰

《藏汉大辞典》的词语翻译..... 176

崔德稳

漫谈汉朝翻译..... 189

郑俊基

中世纪朝鲜翻译事业浅析

考察和研究中世纪朝鲜翻译事业的繁荣及其原因和标志，以及翻译理论方面的成就，不仅对我们发展朝鲜族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翻译理论和翻译事业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一

朝鲜王朝世宗二十五年(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十二月创制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这为朝鲜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当然也为朝鲜的翻译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我们知道，朝鲜在尚未创制文字之前，历来使用的是汉文。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期，作为官方的书写手段，曾出现过“吏读”法。用来记录官方文件的，称之为“吏礼”；用来记录歌谣的，称之为“乡礼”；作为助词，用来阅读汉文典籍的，则称之为“口诀”。目前我们较容易见到的《沈阳状启》(昭显世子撰)，用的就是“吏礼”；《新罗乡歌》、《均如乡歌》、《悼二将歌》凡二十六首，用的则是“乡礼”。“吏读”法，用“果”标记“斗”或“斗”，用“乙”标记“을”或“를”，用“加于”标记“더욱”，用“必只”标记“반드시”，用“为去乙”标记“하거늘”，用“是去乙”标记“이거늘”，用“为去

乃”标记“하거나”，用“是去乃”标记“이거나”，用“为遣”标记“하교”等等，用来记录朝鲜语言的虽然是汉字，但读音不同。

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笔译，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由于历来使用汉文，另一种形式的笔译依然存在，那就是把用朝鲜语言口头创作的东西译成汉文记录下来。这是朝鲜翻译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种笔译，恐怕很早就已开始。高丽忠烈王年间（公元1275—1308年）高僧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中，有关首露王创建驾洛国的神话里，就有这样的一首四言译诗：

“龟何龟何，
首其现也。
若不现也，
潘灼而吃也。”

朝鲜不少古老而灿烂的文化遗产是通过这种翻译保存下来的，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朝鲜历史和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因此，这种翻译意义极为深远，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朝鲜翻译事业的真正起步和繁荣，应该说是朝鲜文字“训民正音”创制并颁布推行之后。

二

查中世纪朝鲜的翻译文献，主要是将汉文图书译成朝鲜文，同创制文字之前正好相反；而翻译的汉文图书虽然包括一部分朝鲜本国编撰的，但大多数是从中国购进的，也与创制文字之前不同。

“训民正音”于世宗二十五年创制、并于世宗二十八年八月正式颁布推行之后，在不长的一段时期内，翻译印行的图书门类之广、数量之多都是空前的，这是中世纪朝鲜翻译事业繁荣的重要

标志。

语言学方面的译著有《古今韵会谚解》（世宗二十六年）、《洪武正韵译训》（世宗二十七年至端宗三年）、《四声通考》（世宗二十七年）、《东国正韵》（世宗二十九年）、《译语指南》（成宗九年）、《训蒙字会》（中宗二十二年）等等；

儒家经典方面的译著有《四书谚解》（世宗三十年）、《内训谚解》（成宗六年）、《警民篇谚解》（中宗十四年）、《小学谚解》（宣祖十九年）、《七书谚解》（宣祖二十一年）等等；

佛教经书方面的译著有《释谱译节》（世宗二十九年）、《首楞严经谚解》（世祖八年）、《妙法莲华经谚解》（世祖九年）、《佛说阿弥陀经谚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谚解》（以上世祖十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谚解》（世祖十四年）、《永嘉证道歌南明继颂谚解》（成宗十三年）、《观音经谚解》（成宗十六年）、《佛说大报恩重经谚解》（明宗八年）等等；

农艺医术方面的译著有《急救方谚解》（世祖二年）、《蚕书谚解》（世祖七年）、《乡药集成方谚解》（成宗十九年）《农书谚解》（中宗十三年）、《简易辟瘟方谚解》（中宗二十年）、《谚解胎产集要》（宣祖四十一年）等等；

文学作品方面的译著有《龙飞御天歌》（世宗二十九年）、《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成宗十二年）、《联珠诗格》、《黄山谷诗集谚解》（以上成宗十四年）、《百联抄解》（明宗年间）等等。

三

“训民正音”创制并颁布之后，朝鲜的翻译事业之所以出现如此空前的繁荣局面，首先是同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世宗、世祖、成宗

等几代国王亲自主持和大力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官修的朝鲜王朝历代国王实录记载，译著的大多数是奉当朝国王之命翻译印行的，有的甚至是由当朝的国王和世子、王子亲自翻译的。

例如，“训民正音”颁布之后首先问世的《龙飞御天歌》一百二十五章，就是奉世宗之命，由权踰、郑麟趾、安止等翻译的。又如《永嘉证道歌南明继颂谚解》三百二十篇中，三十篇是由世宗亲自翻译的，其余的则是由王子首阳大君（后来的世祖）翻译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宫中设置“集贤殿”和“刊经督监”等机构，网罗各种人才，有力地开展了各类图书的编撰和翻译等工作。

“集贤殿”是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设置的，到世宗十八年定员二十名。先后在“集贤殿”从事编撰和翻译等工作的有名的学者有柳宽、卞季良、尹淮、权踰、郑麟趾、权採、南秀文、柳义孙、辛硕祖、鱼孝瞻、崔恒、李石享、梁诚之、申叔舟、成三问、朴彭年、河纬地、李璿、柳诚源、徐居正、成任、李克培、李克堪等等，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集贤殿”的学者们不仅和世宗一道创制了“训民正音”，而且参与了除佛教经书之外的大多数译著的翻译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佛教经书的翻译出版机构“刊经督监”，于世祖七年（公元1461年）设置。在国王世祖的亲自主持下，以僧人信眉、慧觉、守眉、妙觉等和学者韩继禧、尹师路、黄守身、卢思慎、姜希孟等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书。

为了推动各类图书的编撰翻译工作，以世宗为代表的朝鲜王朝的统治者，不仅动员了著名的“两班”（贵族）士大夫文人，而且还聘请了寺院中学识渊博的高僧，甚至起用了确有真才实学

的未仕的“白衣”（平民）学者。例如，参与《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注译工作的柳休复（字斯文），就是一个“白衣”学者。据成俔的《庸斋丛话》载，“缘父之罪”、“禁锢终身”，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的柳休复，“以白衣往参，人皆荣之。”

当然，中世纪朝鲜的翻译事业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应该说是以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为其基础的。需要指出的是，朝鲜王朝造纸业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提高，为各类图书（包括译著）的印行创造了物质基础。

朝鲜王朝在太宗十五年（公元1415年）就设置了“造纸所”（到世祖十二年改称“造纸署”），在地方设置了造纸坊“纸匠”。那时，从事造纸手工业劳动的工匠达六百九十八名，是在各种手工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当时研制的纸张达二十种之多，其中全州的“筒壮纸”、南平的“扇纸”、宁边的“白露纸”、平康的“雪花纸”世称佳品。至于印刷术方面，我们知道早在高丽高宗二十一年（公元1234年）就已经有了金属活字印刷。朝鲜王朝建国之后，太宗三年（公元1403年）便设置了“铸字所”，当年就铸制了活字“癸未字”。接着，世宗二年、十六年、十八年，世祖元年、十年，成宗十五年、二十四年又陆续铸制了新的金属活字，分别称为庚子字、甲寅字、丙辰字、乙亥字、乙酉字、甲辰字和癸丑字。至今犹存的印本告诉我们，朝鲜王朝的活版印刷是相当精美的。

四

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以世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广泛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翻译事业的目的究竟何在？关于这一点，他们始终是毫不隐讳的。

如前所述，“训民正音”颁布之后第一个问世的译著是《龙

飞御天歌》。奉世宗之命撰写并翻译的这部诗歌，是直接为“化家为国”的太祖、太宗歌功颂德的。又如《释谱译节》，则是世宗为了超度昭宪王后的亡魂，令首阳大君编纂并翻译的。通过歌功颂德，宣扬王权神授，显然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

与此同时，大量翻译印行《四书》、《五经》之类儒家经典，则是为了精神上奴役平民百姓。甚至翻译印行文学作品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下面以《分类杜工部诗谚解》（简称《杜诗谚解》）为例，简单剖析一下。

金诉在《翻译杜诗序》中说：“惟上之十二年月日召侍臣，若曰：‘诗发于性情，皆足以劝惩人。大哉诗之教也。《三百》以降，惟唐最圣，而杜子美之作为首。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集诸家之所长，而大成焉。诗至于子美，可谓至矣，而词严意深，世之学者患不能通。夫不能通其辞而能通其诀者未之有也。其译以谚语，开发蕴奥，使人得而知之。’”（见《颜乐堂集》）

而关于国王所谓“开发蕴奥”、“以劝惩人”的旨意，曹伟在《〈杜诗谚解〉序》中说的更清楚、更具体：“臣切惟诗道之关于世教也大矣。上而郊庙之作，歌咏盛德；下而民俗之谣，美刺时政者，皆足以感发惩创人之善恶，此孔子所以删定《三百篇》有无邪之训也。诗至六朝，极为浮靡，《三百篇》之音坠地。子美生于盛唐，能抉剔障塞，振起颓风，沈郁顿挫，力去淫艳华靡之风，至于乱离奔窜之际，伤时爱君之言出于至诚，忠愤激烈，足以耸动百世。其所以感发惩创人者，实与《三百篇》相为表里，而指事陈实，号称诗史，则其后世嘲风咏月，刻削性情者之所以可拟议耶。然则圣上之留意是诗者，亦孔子删定《三百篇》之意，其嘉惠来说，挽回诗道也至矣。噫，《三百篇》一删于孔子而大明于朱氏之辑注，今是诗也，又因圣上而发挥焉。学诗者苟能模范乎此，臻无邪之域，以抵《三百篇》之蕃垣，则岂

徙制作之妙高出百代已耶。我圣上温柔敦厚之教，亦将陶冶一世，其有补于风化也为如何哉。”

很清楚，以世宗为代表的朝鲜王朝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注译印行杜诗，是为了以杜诗为“模范”，“嘉惠来学，挽回诗道”，“臻无邪之域，以抵《三百篇》之蕃垣”。这显然是他们翻译印行杜诗的目的之一，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为了用“号称诗史”的杜诗来“感发惩创人之善恶”，“陶冶一世”，“补于风化”。其政治目的可谓明矣！显然这是翻译印行各类图书的共同的目的。“大哉诗之教也。”他们是深知文学（包括诗歌）的社会作用的。

五

以世宗为代表的朝鲜王朝统治者广泛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翻译事业，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推行和普及“训民正音”。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朝鲜的“两班”士大夫阶层是使用汉字的，他们大都以汉文写诗作文，并以此为荣的。即便是有了“吏读”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广大平民百姓却从来都是不认汉字、不懂汉文的，这一来是由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二来则是由于朝鲜语与汉文之间的距离太大所造成的。即便是有了“吏读”以后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世宗和《集贤殿》的学者们创制的“训民正音”，反映了广大平民百姓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加上“训民正音”二十八个字母本身（后来又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不管是从语音学角度来说，还是从文字学角度来说，都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和科学性。由于学起来容易，记起来不难，写起来笔划又少，自然而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因此，经世宗、世祖、成宗等人五十多年的努力推广，“谚文”（即朝鲜文）很快被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甚至深入到妇女之中。当然，文人士大夫阶层依然是使用汉文，有时使用“谚文”也不过是为了给汉字标上正确的发音而已。很多人甚至不屑一顾，至死不懂一个朝鲜文字母。例如，著名的《热河日记》的作者朴趾源就在《燕岩集》里曾如此慨叹过：“吾之平生，不识一个谚字……至今为遗恨耳。”这就同辽王朝创制的契丹大字和小字完全相反，契丹大字和小字，虽在上层推行，却未被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所以后来就泯灭了。一种文字，既有科学性，又为群众所接受，那么其生命力是无穷的。

“训民正音”既然已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他们要求阅读、要求书写是必然的。反过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思想上的统治，统治阶级不断编撰和翻译出版他们以为有助于“陶冶一世”“补于风化”的“谚文”图书，也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虽然燕山君（后来被废黜）曾一度下令禁止讲授和使用“谚文”，甚至放火焚烧“谚文”图书，也未能阻止“谚文”的使用，未能阻止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趋势。

六

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而他们在艰难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应该说是中世纪朝鲜翻译事业繁荣的又一个标志。

翻译，当时称作“谚解”，即用“谚文”解释原文之意。通常情况下，译著包括原文、注释、译文等三个内容，有的如外语教材《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捷解蒙语》等，则还用“谚文”在原文之下或之旁标上读音。这种形式，为后世的翻译开了良好的先例。目前我们翻译古文，通常情况下，也是译文

之下附原文，难解之处加注释的。

众所周知，所谓翻译，简单地说，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字，但所表达的意义不变，这才是正确的翻译。当清末民国初年的严又陵先生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时候，把“信”放在首位；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鲁迅先生针对当时所谓“宁顺而不信”的贻误读者的谬论，也曾提出过“宁信而不顺”的主张，首先强调的都是翻译的准确性。那末，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中世纪朝鲜的翻译家们在五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译其意旨”（见曹伟《杜诗谚解，序》）的著名论断。

不言而喻，所谓“译其意旨”，正是把握并表达原文的意义即内涵的意思。在翻译杜诗的时候，曹伟等人提出“以谚文译其意旨”的翻译原则，意义极为深远。因为这个原则，不仅阐明了翻译的实质，为杜诗的注译者们指明了翻译的正确方向，而且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开拓了翻译杜诗的正确途径，这就是金诉在《翻译杜诗序》中指出的“以谚字译其辞，俚语解其义。”

所谓“以谚字（即朝鲜文）译其辞，俚语（即朝鲜语）解其义”，把“辞”与“义”的辨证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字，就是“译其辞”；而这一种语言文字虽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却不变，便是“解其义”。这就是说“译其辞”的落脚点是“解其义”，而“解其义”的手段则是“译其辞”。“辞”是媒介，“义”是根本。只有把“译其辞”和“解其义”统一起来，才能使“疑者释，窒者通”，“一览了然”，即可达到“译其意旨”的目的。

中世纪朝鲜的翻译家们早在五百多年前就能提出“译其意旨”的翻译原则，并把它运用在翻译实践中，在实践中又总结出“译其辞”“解其义”的宝贵经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提出的“译其意旨”的翻译原则，不仅是朝鲜翻译史上的一座丰

碑，也是世界翻译理论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此外，他们在译出原文的风格和特点、原诗的韵律和对仗等方面也做了积极的探讨，只可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归纳总结。

探讨和研究中世纪朝鲜的翻译实践、翻译经验和翻译理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我这一篇引玉之作，由于资料不足，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望有关专家学者予以斧正。

陶·哈斯巴根

宫布扎布和他的翻译理论

宫布扎布是清代著名的蒙古族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所总结的翻译理论不仅在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史料记载，宫布扎布系成吉思汗第23代后裔。他出生于西乌珠穆沁旗（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境内），生卒年代不详。据有关资料推算，大约生于1680年左右，死于1750年之后，享年七十有余。

宫布扎布身为旗和硕亲王之侄儿、旗协理台吉的儿子，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进京师读书深造。此后，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间，他在京师的藏文学堂任总教习，长达二十余年。

宫布扎布精通蒙、藏、汉、满四种语言，一生完成了许多著作。其中，《恒河之流》是宫布扎布以帝王绪统为纲，用蒙古文撰写的编年体蒙古史。这本书记录了自公元970年以来历代蒙古帝王世袭及各旗王公继位的历史。宫布扎布的藏文著作《汉区佛教源流记》于1746年完成。此外，他在其《元音字母及辅音字母》这一语言学著作中，对于同梵文字母发音相同的藏文字母和蒙古文字母进行了详细说明。宫布扎布兴趣广泛，精力过人，他还研究过医学，在《药方》一书中不仅收集了大量的蒙医偏方，而且还收集了不少藏医、中医以及印度医药方。

宫布扎布与其他人合作编写的《智慧之鉴》一书，在翻译史